

文匯时评

中国新闻名专栏

8月26日,亚运会首枚电子竞技金牌由中国队夺得。从外形上看,电竞项目的金牌与其他赛事的金牌无二,但却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过去20年被认为是洪水猛兽的电竞,这一次真的登上了大雅之堂。在这个历史节点,我们应重新审视和深入梳理亚文化的当代变迁,及其所连带的复杂历史影响。

亚文化呈现“全年龄向”和对传统文化的拥抱姿态

亚文化这个词汇来自英语subculture。其前缀“sub”意为“之下的”“次级的”,顾名思义,subculture就是“主流文化之下的次级文化”。1950年,英国社会学家大卫·雷斯曼首次提出大众和亚文化的差别:大众是“消极地接受了商业所给予的风格和价值”的群体,而亚文化则具有探索精神,“积极地寻求一种小众的风格”。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亚文化的这一特征保持着极为

从亚运电竞金牌看中国亚文化的创造性

孙佳山

中国青年亚文化正在生成具有世界意义的原创经验

网络游戏是亚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和载体。本次雅加达亚运会《英雄联盟》表演项目中国队夺冠后,社交媒体上瞬间被消息“刷屏”,在央视App“央视影音”发起的“亚运之星”投票中,前7名中竟然有5位都来自《英雄联盟》项目,足以见得电竞的号召力之大。其实,作为移动互联网普及程度最高的国家,电竞的“走红”只是我国亚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天翻地覆变化的一个缩影。自去年开始,我国的亚文化现象开始不断涌入主流视野,包括在过去一直处于大众视野之外

的喊麦、街舞等亚文化文艺表达方式,也因为其争议性而形成了强烈的话题效应,获得了主流媒介的持续性关注。

面对我国以青年文化为主体和主力的亚文化现象,我们应该有着更为纵深的历史视野。因为在20世纪历史中,好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可以深入到主流文化所不能覆盖的区域。青年文化无论作为现代性的先锋性、探索性的排头兵,还是扮演看亚文化形态的探索角色,始终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在当前,我们所不断讨论和反思的、受到全社会持续关注的青年亚文化问题,其实质就是在讨论青年亚文化的创造性问题。只不过,在移动互联网作为整个时代的远不止是媒介意义上的基

础设施已经搭建完毕的历史语境下,我国的青年亚文化问题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复杂形态。在不断加深的主流化、商业化过程中,一方面青年亚文化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改变,但另一方面,应警惕青年亚文化沦为娱乐消费符码,保有先锋性、创造性才能为其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撑。

重新反思亚文化现象的内在演化逻辑,当下我国的亚文化现象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开始基本超脱出欧美曾经的、被我们以“常识”来接受的概念范畴,正在生成具有世界意义的原创性文化经验。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文化视点

在数字阅读发达的今天,纸质书的装帧设计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为一本书找到只属于它的装帧设计



■本报记者 范昕

原来书籍可以如此之美。2018上海书展上,位于主会场内的“世界最美的书”设计艺术展吸引了不少读者驻足流连,赞叹声不断。这里汇集的,是近两年“世界最美的书”获奖作品、15年来中国获得“世界最美的书”奖项的作品,以及2017年“中国最美的书”获奖作品。它们各有各的巧妙妙想,却又约而同富有书卷气,予人想要翻看的冲动与愉悦。

但是,与这些一见就令人爱不释手、进而对书籍文本本身产生阅读兴趣的装帧设计作品不同,现在图书市场上有不少书籍的整体装帧设计水平不高。有的粗糙,根本看不到设计含量;有的夸张刺眼,其设计往往脱离图书本体,封面图片与书中内容张冠李戴;有的设计彼此雷同,图书封面“撞脸”……

在数字阅读相当发达的今天,纸质书除了内容本身,其外在的装帧设计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赢得读者的青睐?

粗暴式、套路化的“抢眼”,对阅读形成干扰

尽管如今国内的书籍装帧设计水平有

了明显的提高,记者却在图书市场上留意到,不少书籍的整体装帧设计水平仍然不尽如人意。有些图书只顾封面抢眼,但这种抢眼,是简单粗暴式的,比如不少财经、励志类图书,书名几乎占去封面的半边天,唯恐读者看不到其中“成功”“财富”等关键字眼;有些图书封面色彩花枝招展、哗众取宠,组合方式却极其套路化,比如大幅历史人物图像似乎是历史类读物的标配,恐怖类小说的封面绕不开骷髅、鲜血、蝙蝠等元素;还有些图书不顾内容,盲目给图书穿金戴银、“浓妆艳抹”,过度包装,目的似乎仅在于提高书价。

而反观很多当选为“世界最美的书”或“中国最美的书”的图书的装帧设计,并没有炫目的外表,鲜见浓墨重彩的表现方式,大多素净、大方,初看甚至有些不起眼。但它们以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书卷气或是文化气质深入人心。且看2018年度荣获“世界最美的书”银奖的《园冶注释》。这是我国著名园林学家、造园学家陈植为明代造园学家计成所著《园冶》做的注释专著。设计师张悟静为其选用的封面是素净的赭黄色,更多的心思藏在细节之处。比如,全书标题采用中国传统的木刻体并做了错位设置,以此展示中国字体的魅力;

用著名园林的图片作为隔页以及书法拉页,丰富视觉感受且利于阅读。这本书最终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于,整体呈现出的古韵、古色、古香。

在书籍装帧设计界,好的设计其实是在留住人们目光的同时,利于读者的阅读体验,激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唤起人们对图书文化性的尊重。而时下不少看似“抢眼”的图书装帧设计,其实恰恰是对这层意思的背离。

装帧设计充当起纸书突围的重要手段

“有了电子载体之后,可能我们要更多地想想纸质书能做些什么,哪些是纸质书最本质的特征,纸质书和电子阅读的区别在哪里。”书籍设计师刘晓翔日前于上海举办的一次书籍装帧论坛上直言。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势汹汹的电子书完全能够提供纸质书所拥有的内容时,书籍的装帧设计已然充当起纸质书突出重围的重要手段。

“书籍装帧设计的良莠不在表象,而在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整体美。这是一种整体设计。”书籍设计大家吕敬人指出,图书装帧设计需要由表及里,与文本内容融

人在一起,想方设法通过设计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顺畅的阅读桥梁。刘晓翔也认为,书籍设计其实是设计师基于文本的创造,甚至设计本身就是文本。据了解,在图书装帧设计业相当成熟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书籍设计与内容创作往往是同步的,在图书编辑的初期就已深度介入。书籍设计师更像是图书的第二作者,主动寻找、放大隐藏在文本之后的精神内核,最终呈现给读者的阅读效果是“1+1>2”。

有专家认为,能否寻找到只属于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其实是在呼吁当下的书籍装帧设计应该尽可能多地传达书中独特的内容,呼应书中独特的气质。日本图书设计大家祖父江慎就用自己的创新性实践留下了不少经典案例。他在设计京极夏彦的一本主要讲述相扑力士故事的书时,在封面上设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这些汗珠用树脂制成,不仅立体突出,摸起来还有着黏黏的手感,给人就像摸到汗湿皮肤的触感;在为糸井重里收集了种种口误的《口误》系列书籍设计时,他干脆将在做书的方式上制造了一连串不经意的错误,比如把书脊上原本应该贴在封皮和书页中间用来固定书籍的胶布贴到了外面,偏要让强迫症抓狂。

保护好历经漫长岁月磨砺的纹圈房,就是保护城市文脉、留住城市记忆

让老建筑成为上海不可缺少的文化环境

造,历时十几年方告完工,共有28间房屋,占地两亩多。这里迄今还住着两对老夫妻。

委员们一行来到时,92岁的老中医顾梦生老人正在朝南的屋内对着报纸习字,这间房的门口仍然挂着醒目的“顾梦生诊所”招牌,年代久远的医书、老式听诊器整齐地摆放在书桌上,泛黄的墙上贴着老人生平所获得的奖状。顾梦生的叔叔、89岁的顾桂馨老人告诉记者,这栋房子是曾祖父所造,他是住在这里的第四代。

和顾家老宅相比,位于棋杆村平桥469号的张家老宅显得更为低调。从外观看去,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张家老宅和周围的农家院落并没有区别,步入其中才依稀可见纹圈房的结构。对于老宅的修缮,张家的后人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大家都希望“修旧如旧”,但当年所用的建筑材料,大到砖瓦,小到一枚木插销,现在都无迹可寻。这也成了纹圈房保护面临的共同难题。

可是与散落在上海各个角落、甚至面临着拆迁的纹圈房相比,顾家老宅和张家老宅又是幸运的。浦东新区去年公布的320处区文物保护单位中,这两处老宅被列入其中。周浦镇党委书记周俊介绍,这两处纹圈房已明确了村委会和户主共同保护主体,由镇文物保护主管部门——文化服务中心定期走访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修缮解决。此外,曾有相关人士建议,可以将棋杆村的这两处纹圈房作为陈列馆进行保护。

“有原住民住在其中,他们愿意讲述老房子的故事,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实地探访了纹圈房后,市政协委员杨德钧感慨地说道。委员们一致认为,在城市更新中,保留这些老建筑,更是留下一份乡愁、一份城市记忆。

在城市更新中,类似纹圈房这样没有“名分”的老建筑并不在少数。对此,马建勋建议,应先对这类建筑是否具有文物属性进行讨论、组织认定。“对需要保护的建筑明确责任,不仅仅是政府要有所担当,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此外,保护老建筑还要和改善民生、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相结合。良好的保护方式应该是让老建筑成为老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环境,提升大家的获得感。”他表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第一辑)十卷本出版

东京审判庭审记录首次以中文完整面世

本报讯(记者许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第一辑)出版,10卷本约500万字,按原始文献时间顺序,完整呈现了从1946年4月29日到1946年12月9日共128个庭审日的庭审记录。昨天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新书座谈会上,学界评价,这是东京审判庭审记录首次以中文形式完整呈现,史料价值重大,也为读者准确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权威文本。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是战后审判研究最核心的文献,全译本40卷以2013年出版的英文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为底本,酌参日文版庭审记录,合计约2000万字,计划分四辑陆续出版,庭审内容包括从1946年4月29日至1948年11月12日的庭审准备、庭审至宣判的记录,涵盖检方向法庭和被告提交起诉书、法庭成立、立证准备、检方立证、辩方反证、检方反驳辩方反证、检方回答和法庭判决等全过程。

“二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亚太秩序的研究,都离不开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的翻译和梳理有助于深入学术研究,从学理上抵制日本右翼分子。保存这份历史记忆是中日乃至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责任。庭审记录是对有意篡改歪曲历史现象的对抗。”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说。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由程兆奇教授、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瀚之子向隆万担任丛书主编,20余位来自国内外高校的法学史学专家组成翻译团队,潜心审校,反复加工打磨,历时三年完成。“翻译难度不仅在于法律、历史、政治术语,就拿人名、地名来说,牵涉到日本、中国、菲律宾等非英语国家就十分复杂。”向隆万说,仅“七七事变”时华北主要军事负责人之一秦德纯的名字,在庭审记录中就有13种拼法,需仔细辨别。

除了翻译,全译本还进行了导读,令读者清晰看到庭审脉络。其中,最受中国读者关注的对华侵略部分的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的建立、南京大屠杀、日本在东北等地的鸦片毒化政策、日本对中国经济侵略等细节一一呈现。如第3、第4卷展现的1946年7-9月针对南京暴行检辩双方举证的部分,详细呈现了金陵大学医院外科医生威尔逊、曾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工作的许传音、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尚德义、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茨等数十人的法庭证言。

“东京审判出版工程”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长期打造的重出版项目,依托上海交通大学东大学东审判研究中心,系统搜集、整理、出版东京审判核心文献与研究著译,迄今已出版200余卷。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第一辑)书影。

进一步加快科创中心建设步伐

(上接第一版)

尹弘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上海工作的指示要求,进一步增强推动科技事业发展、推进科创中心建设的使命责任感,坚韧不拔自主创新、锲而不舍服务国家战略。

尹弘指出,要研究解决重大关键问题,进一步加快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步伐。要强化科技创新的前瞻布局,准确把握重大布局的方向选择、实现路径和实施办法,聚力抓好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做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转移转化,积极探索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优化分配方式,培育打造高水平科技中介机构和专业化转化服务平台。要下大力气集聚和用好各类科技人才,聚焦创新策源能力和优势产业,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政策并充分发挥政策最大效用。要大力弘扬爱国奉献精神、科技报国信念,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激情,积极创造宽松包容的科研环境,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相关委办局、部分高校、各区政府分管领导,以及市科技系统各单位党政负责同志等近300人参加开班式。